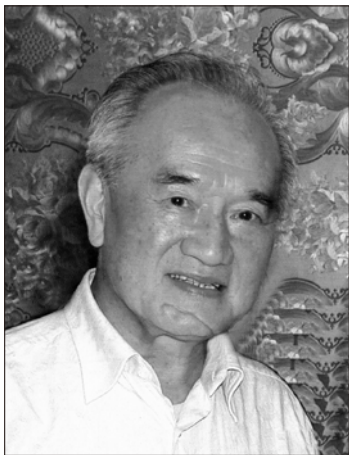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历尽坎坷 无怨无悔

○石琪高（1958土木）



石琪高学长

我这个人性格可能从小就定型了，直脾气，干事情执著，天生爱打抱不平。我从印尼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念了四年半书，1958年毕业前夕就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然后被戴帽分配到广西进行改造。

清华大学的“反右”扩大化先从教授开始。有位数学教授讲课得非常好，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这个教授已经是“右派”了，要求学生只能听他上课，课前不准起立，也不能给他鞠躬，他也不准给学生鞠躬。特别可怜的是这么一个老教授被打成“右派”就是因为讲了一句话，说苏联进口的机器太笨重了，就是讲了这么一句实话便被打成了“右派”。

在最初阶段，我还是“反右”的积极分子，当时批斗钱伟长老教授我也很积极的。我记得，在“反右”运动中《中国

青年报》还刊登了记者采访我时我讲的一句话：“‘反右派斗争’是一种清醒剂”。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批判，我感到这个事情搞得太过了，就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。

当时整个“反右”运动搞得轰轰烈烈，我就在这个当口提了意见。我说党不能对运动放任不管，要出来抓一抓了，有这么多人被打成“右派”肯定是有问题的，而且运动把学校秩序都搞乱了。于是有人说我反党，说我对“反右”运动有看法、有不满情绪，这是我的一条罪状。在被打成“右派”前，我是土木工程系学生会体育部的部长，也是黑板报的编辑，还经常给黑板报和校刊写些文章。得到稿费我都慷慨地请大家吃一顿，这个事情后来也算是我的一条罪状，说我用资产阶级的金钱腐蚀同志。现在听起来是很可笑的事情，可当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。

没过多少日子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1958年2月4日立春那一天，我的宿舍和走廊里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后来有人通知我，今天你就不要去上课了，也不准外出，就在房间里呆着，准备接受批判，就这样我成了“漏网右派”。

“文革”期间我曾经在批斗中被打折了两根肋骨，有两次在几秒钟之内，就能决定我的生死，结果我还是活下来了。后

来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，就逃跑了。当时我和我爱人还没有结婚，她在鹿寨县插队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只有到鹿寨县去找她。可还没有找到她我就被当地农民发现了，他们把我抓起来，用手指粗的麻绳绑了我一天一夜，到现在我手上还有当时被捆的痕迹呢。第二天我被拉出来示众。那次批斗非常危险，我差一点就被打死了。我爱人得知我去找她的消息后，马上跑到鹿寨县武装部报告，说石琪高是个归侨，被造反派抓了，被打得很厉害，有生命危险。武装部的政委亲自赶到现场，制止了造反派的施暴，把我给救了。如果我爱人带的人再晚几秒钟到，我可能真的就被他们打死了。

那次没有打死我，但打折了我的两根肋骨，我的牙齿也被打掉了4颗。即使把我打成这样，造反派也没有放过我。他们把我从鹿寨县押回了柳州市，我被蒙着眼睛关在市委礼堂里整整42天，这42天真是无法想象我是怎么过来的，那真叫是暗无天日啊！是什么布蒙的眼睛我都不知道，就这么蒙着眼睛躺着不准起来，想解大小便要报告，然后由一个打手拿着棍子带我到厕所，眼睛依然被蒙着。吃饭时蒙着眼睛坐着吃，吃完躺下，眼睛还是蒙着。吃的东西就是一碗饭、一个菜，我数了数，菜里最多只有12粒小豆子，一天就一顿饭，根本吃不饱。造反派这么做，就是给你点吃的，保证人死不了，让你活受罪。

我这个“右派”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当上柳州市的市长。1983年广西党委对柳州市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，我和田民搭档，他当书记，我当市长。20世纪80年代初“右派分子”当市长的情况，在全

国我可能是唯一的。

社会普遍认为，当官能当到市长这个份上的人，总要有背景，要么是老红军的后代，要么是其他什么条件……一个归国华侨怎么能当市长呢？在当时那种社会舆论背景下，很多人对我当上市长的事很不理解。于是，有人找到当时重用我的田民书记，问他为什么要选我当市长。他回答道：“我就是专门要用那些有能力的‘右派’分子。”在他看来，当年被打成“右派”分子的人，有一部分是精英。除了我，他还用了两个“右派”分子当厂长。我被市委市领导发现是在柳州市“群英会”上，柳州市每年都要召开表彰先进工作者大会，也叫“群英会”。我曾经四次代表市建二公司出席大会，我的事迹市领导也因此都知道了。市领导看我是个归侨，又曾经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就非常关心我。当时柳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叫欧济文，延安抗大出身，我当市长就是接他的班，是他最初发现了我，他曾专门派人去看我。当时我一家5口人只住在一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，条件非常差，他了解情况后很感动，又了解到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，就想重用我。

1983年初，党中央有一重要文件规定，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选拔“四化”人才，即具有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背景的人。根据“四化”的要求，柳州市长人选当时先由各部门、各单位提出近1000人，第二次筛选到600多人，再精选到410人，最终剩下5个人。每次都有我的名字。当时我的情况比较符合中央有关“四化”人才的要求。从革命化来说，当时我完全可以回印尼继承财产，但我没有

□ 我与清华

回去，这是有记载的，这说明我爱国。从我一生的思想成长逻辑来说我也不可能再回印尼，我是坚定地要跟共产党走的，这一点我确实从来就没有动摇过。这样一个爱国华侨在政治上肯定是可靠的。我是20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生，在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面也没什么问题，20世纪80年代初有我这样学历背景的人非常少。我还连续四次参加“群英会”，是市二建公司劳动模范，从个人表现来看也没的说。最后定了5个人选，1个市长4个副市长，但谁当这个市长还是定不下来，最终田民书记推荐由我当市长，他讲了4个理由，石琪高一一是热爱祖国，二是清华毕业，三是劳动模范，四是表现优秀。

1983年12月30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决定由我当柳州市长，31日通知我去开会。当时柳州市委会议室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，获知让我当市长的消息后，我都蒙了。会议上我一时讲不出话来，会议怎么开的也不知道，脑子里尽是考虑这个市长怎么当。在这之前，政府的任何部门我都没有去过，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，一下子就叫我当市长，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回到家里，老婆看我垂头丧气的，就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说区党委领导让我当市长，她说那不很好吗？我说好你去当看。真的，当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兴奋，我有整整三个晚上睡不着觉。第一次参加市委常委会议时，我讲了一席话，没有讲别的，就是讲我的压力太大。田民书记说：“好，我选对人了的，假如说你当了市长以后还能睡大觉那就不行了，你睡不着觉正说明你有责任心。你一定能干好的。”

我是1982年12月14日入党的，1983年

12月14日应该转正，但没有按期转正。12月31日市委第一次召开常委会的时候，田民书记问我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，我说已经到了转正的日期但还没有给我转正。他当即打了一个电话，第二天我的转正问题就解决了。党内有规定，党龄必须在5年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就任市委常委，那个时候我刚刚转正，按规定是没有资格参加常委会的。而田民书记的主张是，市长不参加常委会无法开展工作。他就此事请示了自治区党委，经区党委会同意，我可以列席常委会，并可以列席每周一次的书记碰头会。列席会议者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。每次开会时田民书记都让我先讲话，他要我大胆地讲、大胆地干，错了是他田民的，成绩是石琪高的，他说，他是老党员，是书记，应当承担责任。在这样的书记领导下做事情怎么能不大胆地去干呢？老百姓都说我石琪高当市长时做了很多事情，实际上我心里明白，没有田书记支持、鼓励和帮助，我是很难做出成绩的。当时我和田民搭档的那个班子是很团结的，田民书记非常重视人才、爱护人才。

从清华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柳州市市政工程队。我记得是1958年9月12日来的，当时市政工程队一共才29个人，1959年一下就增加到200多人，遂改名叫市政工程处。人员增加了以后，就派了一个转业了解放军大尉来担任书记。我是戴帽“右派分子”，按规定拿不到正式的工资，只能拿一点生活费。1959年10月1日我摘掉了“右派”的帽子，但生活待遇没变，我的身份也没变，仍是“右派”，国庆节之前叫“戴帽右派分子”，之后叫“摘帽右派分子”。当时大学毕业生第一

年的工资应该是48元，第二年转正就是54元。摘帽以后我的生活费一直是27元5角。直到1962年7月我才按应届毕业生的标准拿到48元钱的工资，当时我的很多同学的工资已是68元了。1963年我的工资才变为54元，直到当上市长，才涨到70多元，落下的这几级永远也补不上了。

当了市长以后，我总是想怎么才能当好这个市长？后来想了一个办法，从我的优势出发来当市长。我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，我就从抓城市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及环保做起，把我熟悉的事情先管好，其他的事逐步地上手。财政工作我交给了当时的常务副市长董世忠管，人事权则交给了杨基常，他是当时的副市长。这些重要的权力都不抓，我就专抓城市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及环境保护。当初有些人就说我石琪高真笨，关键的人权和财权不抓，光抓个城市建设有什么用啊！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我是正市长，他们做出的任何成绩都有我一份，而且50万元以上的大开支还必须通过我来审批，重要的人事安排也要经过我，再交给党委会集体讨论。后来大家都承认，还是石琪高英明，老百姓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就是城市建设，楼房盖多了、道路修宽了、工资增加了，他们就会叫好。老百姓不管是谁抓的财政，是谁抓的人事，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拥护谁。前几天有一个孩子问他奶奶现在谁是柳州市的市长，他奶奶还说是石琪高呢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市长的那几年，真的是为柳州市的老百姓干了一些实事，柳州市的老百姓对我的印象也很深。

2000年8月，柳州市新一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立。上级派了一个新的书记

来，叫沈北海，现在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。沈北海书记到任没几天就到我家里来看我，一进门就叫我石市长，说我来看望你了，你是柳州市的有功之臣。听他这样称呼我，我很感慨地对他说，敢到我家来看我的书记有两个，第一个是田民，第二个就是你。他接着说：“我来看你两个原因，第一，你是柳州的有功之臣；第二，我要请你出山帮助我们。”我立马答应说可以，我说你这样看重我，我有很多想法可以提供给你参考。他说，我们准备成立一个顾问团，你一定要来参加。就这样，我就算是重新出山了。但对当年我的那些问题，始终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说法。不过，现在我仍然是正厅级，我也就不去较那个真儿了。

当年，中国侨联法律部主任梁钦汉专门来调查我的事情。他从老百姓那里给我总结出五项政绩：一是办教育，二是修道路，三是建商业，四是发展轻工业，五是治理环境。我在任期间建立了广西第一所全日制大学——广西工学院，我兼任院长。我组织修建了广西商业第一楼——三十层高的工贸大厦。在经济发展方面，1985年和1986年上半年柳州市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经济效益最好的十佳城市，且均排在首位，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“藏富在企业”。我上任时柳江污染很严重，江的两边都是破破烂烂的民房。我组织全社会修筑江堤，第一次实现了政府不掏钱搞城市建设。开始时向社会集资150万，等到堤的大体轮廓修起来之后，再向社会公开提出，谁要在堤边盖房子，谁就出钱把江堤完善起来，用这种方法就把柳江上主要的一段江堤建好了。当时柳州市政建设

□ 我与清华

的这种运作方式是很具有开拓性的，在这之后，全国有很多城市建设都借鉴了我的这套做法。

我从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得到的感悟是：人生道路一直都平坦并不一定是好事，坎坷可能是人生的财富。回顾自己坎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乐趣吧，挫折并没有压垮我，我现在的身体很健康。想想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那些老师们很多都活到八九十岁，他们吃过更多的苦，还能够那么长寿，关键就是做人的心态一定要平和。所以，我个人把三件事情看得很淡：把金钱看得很淡，把坎坷看得很淡，把官

位看得很淡。我还总结了四句话：地位是暂时的，友谊是永恒的，财产是儿女的，身体是自己的。我经历了那么多事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是我，我回国报效无怨无悔。我这个当年立志回国报效的热血青年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在“文革”中几经磨难、几乎丧命，又从一个“右派”分子当上市长，为柳州人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虽然此后我又受到了一些委屈，但说句老实话，我已感到非常满足了……

（本文摘自《蹈海赴国丹心志》，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08版）

古风·携笔从戎

○魏赠应（1963土木）

大学毕业报答党，
为国为民着戎装^①。
峥嵘岁月青春献，
无怨无悔理应当。
今生幸遇贤内助，
三十二岁结鸳鸯。
夫妻分居几千里，
苦辣酸辛她备尝。
任劳任怨好军嫂，
工作育儿压两膀。
桃月首都赴盛会，
科学春风伴我航。

国家领导重科技，
接见代表大会堂。
改革初年家团聚，
调进京城换新岗。
居安思危要进取，
工程建设受表彰。
人生历程驹过隙，
转眼已成两鬓霜。

①1962年12月，从清华大学毕业（学制五年半）。全班31位同学，其中有7个分配到军队的名额，我主动报名，带头参军。在志愿表上只写一句话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”